

他做了好些诗，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的几首诗，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，便来信要和他会面，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，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，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，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，又去跑他的路了。不久，他又一次的被逮捕了……

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，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，他曾经到过的寓所来，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，我也没有这么高慢，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，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，我们相见的原因为平常，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诗，我就发信去讨原文，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，邮寄不便，他就亲自送来了。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，面貌很端正，颜色是黑黑的，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，只记得他自说姓徐，象山，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（怎么怪法，现在也忘却了），他就说她喜欢起得这么怪，罗曼谛克，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。就只剩了这一点。

夜里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，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，还有一个故意的曲

译者，他象是不喜欢『国民诗人』这个字的，都改成『民众诗人』了。第二天又接到一封来信，说很悔和我相见，他的话少，又冷，好象受了一种威压似的。我便写一封信去解释，说初次相会，说话不多，也是人之常情，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，将原文改变。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，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，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，以供读者的参看。他果然译了几首，自己拿来了，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。这传和诗，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，即最末的一本里。

我们第三次相见，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。有人打门了，我去开门时，来的就是白莽，穿着一件厚棉袍，汗流满面，彼此都不禁失笑。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，刚由被捕而释出，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，连我送他的那两本书，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，没有夹衫，而必须穿长衣，所以只好这么出汗。我想，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『又一次的被捕』的那一次了。

我很欣幸他的得释，就赶紧付给稿费，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，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惋惜，落在捕房的手里，真是明珠投暗了。那两本书，原是极平常的，一本散文，一本

私事的人，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。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，不知道是何时，在那里。他仿佛说过，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，那么，当在八九年之前了。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，总之，他那时住在景云里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，不知怎么一来，就来往起来了。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姓范，名平复。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，说有一个绅士，以为他的名字好，要给他儿子用，叫他不要用这个名字了。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『平福』，平稳而有福，才正中乡绅的意，对于『复』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。他的家乡，是台州的宁海，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，而且颇有点迂，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，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。

他躲在寓里弄文学，也创作，也翻译，我们往来了许多日，说得投合起来了，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，设立朝花社。目的是在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，输入外国的版画，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。接着就印朝花旬刊，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，印艺苑朝华，算都在循着这条线，只有其中的一本『落谷虹儿』画选，是为了扫

荡上海滩上的『艺术家』，即戴穿叶耳风纸老虎而印的。

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，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，除买纸之外，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，如跑印刷局，制图，校字之类。可是往往不如意，说起来皱着眉头。看他旧作品，都很悲凉的气息，但实际上并不然，他相信人们是好的。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，怎样的卖友，怎样的吮血，他就前额亮晶晶的，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，抗议道，『会这样的么？——不至于此罢？』

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，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，总之是柔石理想的头，先碰了一个大钉子，力气固然白费，此外还借去一百块钱来付纸账。后来他对于我那些『人心惟危』说的怀疑减少了，有时也叹息道，『真会这样的么？……』但是，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。

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，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，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。由于历来的经验，我知道青年们，尤其是文学青年们，十之九是感觉敏锐，自尊心也很旺盛的，一不小心，极容易得到误解，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。见面尚且怕，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。但那时我在上海，也有一个惟一的但不敢于随便谈笑，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

兵火烧掉了。他的迁渐渐的改变起来，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，但那距离，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。这方法很不好，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，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，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。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，可就走得近了，简直是扶住我，因为我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，我这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，大家都说是失措的愁一路，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，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，我实在看得他吃力，因而自己也吃力。

无论旧道德，从新道德，只要是损己利人的，他就挑选上，自己背起来。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，有一回，曾经明白的告诉我，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。我说：这怕难罢，譬如使惯了刀的，这回要他耍棍，怎么能行呢？他简洁的答道：只要学起来！

他说的并不是空话，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，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问我，那就是冯铿女士。谈了一些天，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，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，急于事功；我又

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头的小说，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。但我又疑心我自己，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，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，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了。——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。她的体质是弱的，也并不美丽。

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，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，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。有一次大会时，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，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，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，另外并无深意。然而他没有来，我只得又托了柔石。

但不久，他们竟一同被捕，我的那一本书，又被没收，落在『三道头』之类的手里了。

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，请柔石去做编辑，他答应了；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，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，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，抄了一份交给他，他向衣袋里一塞，匆匆的走了。其时是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，而不料这一去，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，竟就是我们的永诀。

第二天，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，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，是明明白白的，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。记得说『全传』里讲过一个高僧，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，他就『坐化』了，还留下什么『何立从来，我向西方走』的偈子。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唯一的好方法，『剑侠』盼不到，最自在的惟此而已。我不是高僧，没有涅槃的自由，却还有生之留恋，我于是就逃走。

这一夜，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，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。不几天，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，或被杀了，柔石的消息却很少。有的说，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，问是否是编辑；有的说，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，问是否是柔石，手上有

了铐，可见案情是重的。但怎样的案情，却谁也不明白。他在囚系中，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，第一回是这样的——『我与三十五位同犯（七个女的）于昨日到龙华，并于昨夜上了镣，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。此案累及太大，我一时恐难出狱，书店望望兄为我代办之。现亦好，且跟殷夫兄学德文，此事可告周先生，望周先生勿念，我等未受刑。捕房和公安局，几次回周先生地址，但我那里知道。望望兄勿念。祝好！』

以上正面。『洋铁饭碗要三只如不能见面，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』

他的心情并未改变，想学德文，更加努力，也仍在纪念我，象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。

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，政治犯而上镣，并非从他们开始，但他向来看得官厅还太高，以为文明至今，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。其实是不然的。果然，第二封信就很不同，措词非常惨苦，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，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。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，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，说他已解解往南京的也有，毫无确信；而用电话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，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，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。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。

天气愈冷了，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没有？我们是有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？……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，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，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，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，他的身上中了十弹。

原来如此！……

在一个深夜里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，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；人们都睡觉了，我的女人和孩子，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，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，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，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，凑成了这样的几句：『惯于长夜过春时，挈妇将雏鬓有丝。梦里依稀慈母泪，城头变幻大王旗。忍看朋辈成新鬼，怒向刀丛觅小诗。吟罢低眉无写处，月光如水照缡衣。』

但末二句，后来不确了，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。

可是在中国，那时是确无写处的，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。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，住了好些时，到上海后很爱朋友的责备。他悲愤的对我说，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，要他多住几天，他怎么能够就走呢？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着的心，柔石的拳拳的心。当北斗创刊时，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，然而不能够，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（Käthe Kollwitz）夫人的木刻，名曰『牺牲』，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，算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心里知道的柔石的纪念。

『生命诚宝贵，爱情价更高；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！』

前年的今日，我避在客栈里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；去年的今日，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；今年的今日，我才坐在旧寓里，人们都睡觉了，连我的女人和孩子，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，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，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，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，写下了以上那些字。

要写下去，在中国的现在，还是没有写处的。年青时读向子期『旧赋』，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。然而，现在我懂得了。

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，而在在这三十年中，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，层层淤积起来，将我埋得不能呼吸，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，写几句文章，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，自己延口残喘，这是怎样的世界呢。夜色正长，路也正长，我不如忘却，不说的好罢。但我知道，即使不是我，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，再说他们的时候的。……（二月十八日。）

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，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，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，谈了几句天。较熟的要算白莽，即殷夫了，他曾经和我通过信，投过稿，但现在寻起来，一无所得，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，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。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，翻了一遍，也没有什么，只在一首『Walpurgisnacht（格言）』的旁边，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：

『生命诚宝贵，爱情价更高；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！』